

# 從《新事》到《在真理中實踐愛德》

林瑞琪

二零一一年將是教宗良十三世頒佈《新事》通諭一百二十週年紀念，值得我們預早用一年時間去重溫天主教社會訓導。本文首先介紹教會社會訓導的形成過程，再探討《在真理中實踐愛德》通諭與全球化的關係。《新事》通諭又名《勞工問題》通諭，良十三世在卷首即說明了社會訓導的本意：

革命的變易精神，好久以來即盛行於世界各國，它之超越政治的領域，而影響及於與政治有密切關係的實際經濟方面，原是不足為怪的事。糾紛的因素是顯然的：即工業的發展；科

學的驚人發現；僱主與僱工間關係的變動；少數個人的龐大財產和大眾的貧乏；勞工階級自恃心理的日益增大，及其相互團結的日益緊密；最後，還有普遍的道德敗壞。

目前，此種事態之可驚的嚴重性，使人人心中都充滿痛苦的恐懼；有頭腦的人討論著這問題；重實際的人提出了種種對策；民眾的集會，國家的立法，以及掌握政權的首領，都在忙著處理這問題——真是再沒有一件事情，能比這個更引起大眾的深切注意了。（《新事》，一）

一九九一年，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紀念《新事》通諭頒佈一百週年，指出其重要性，他說「該通諭自頒行後四十週年起，至九十週年期間，不斷有隆重的教宗文獻加以誌念，可見其地位之重要。可以說該通諭在歷史上開闢的道路，是由其他各文獻作其里程碑的。這些文獻是撰寫來向它致敬及把它引用於當時的環境。」（《百年》，一）

然而，我們不能忽略的是，在《新事》通諭頒行之初，在世界上，無論是天主教會內外，都未受到應有的重視。教宗庇護十一世在一九三一年深邃指出《新事》通諭未受時人重視的原因：

大眾雖然表示同意，有少數人卻未免惶惑，結果，就有一些人，甚至有公教教友在內，對於良十三世那種在世人聽來是十分新奇的，但是極高超的教訓，用一種懷疑的眼光來看，因而對旁人亦造成了不良影響。這分通諭那麼勇敢的攻擊著並推翻了自由主義的偶像，掃除了牢不可破的偏見，它是如此遠又如此出人意外的

走在時代前面，因此心靈遲鈍的人便來譏笑著其中對新社會哲學的研究，而膽怯的人則又不敢去測探那驚人的高度。此外又另有些人，一方面雖對這光輝的文件表示景仰，但仍把它視為烏托邦的理想，覺得雖應該如此，但在實際上可辦不到。（《四十年》，一）

但是，儘管當時的人類忽略了《新事》通諭的重要性，但這完全無損其深遠的先知地位。教宗若望保祿二世說，「教宗良預見到『社會主義』所提出的社會秩序，無論在政治、社會、經濟等方面，均將出現各種負面的結果；而那些社會主義當時還不過是一種社會哲學主張，未成爲日後全面組織起來的一種社會運動。當時的社會主義仍不是後來強而有力的國家，亦沒有日後所操縱的大量資源，可是教宗良在抨擊『勞工問題』的各種解決方法時，卻以之爲首，確令人有點訝異。」（《百年》，二）

的確，《新事》通諭頒佈於一八九一年，現代

世界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誕生尚是二十六年之後的事。而教宗良十三世早已預見該等政權出現的可能，確有超乎常人的洞見。然而，更令人佩服的是，教宗良十三世指出社會主義的危險所在。若望保祿二世表揚良十三世說：「他卻準確判斷出這個解決方法的危險性，因為這方法既簡單又急進，對群眾來說，實在非常吸引；當時，新近工業化國家的勞工階層普遍處於極不公的可怖情況，所以這方法更爲危險。」（《百年》，12）

不過，我們也應注意社會訓導與當中對時局的分析有所不同。若望保祿二世界定兩者的分別，指出「本通諭嘗試列出教宗良十三世所頒佈的原則和其成果。這些原則都是屬於教會教義傳統，並以教會的訓導權頒佈。惟是基於牧者的關懷，令我期然對最近發生的事件作了一些分析。不言而喻，教會牧者的責任之一是詳察時事以辨認出宣揚福音的新要求。可是，這些分析並非定論，因為它原則上並不屬於教會訓導的範圍內。」（《百年》，3）

## 社會主義者的方法並未能解決問題

歷任教宗秉承教宗良十三世的思路，並不質疑社會主義者的善意，但卻提出該等人士的善意，不足以解決問題，用教宗良十三世的話說，就是：「社會主義的主張，即財富之公有，實應被徹底棄絕，這已是明顯的事；因為它會損害它原意所企圖加惠的人。」（《新事》，15）值得注意的是，教宗良十三世也承認共產主義有意加惠於工人，可是卻用錯了方法。「因此，我們若要設法改善大眾的生活，我們的第一個最基本原則，便是私有財產之不可侵犯。這個既經確定，我們就可以進一步指出，應該到那裡去發現我們所可找尋的補救辦法。」（《新事》，15）放諸今日，即使連社會主義者，都承認取消私有產權實是「此路不通」。

「對於名爲改變貧富地位，而實質對所幫助的人產生更大傷害的一套方法，通諭亦深知其害處。治病之藥，其害尤大於所患。良十三世認定當時的

社會主義本質，在於取消私有財產，可謂深得其要。」（《百年》，12）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深知社會主義者也曾經有治理「社會不公」這個重病的決心，只是他們用錯了藥而已。

### 〈新事〉通諭形成系列

教宗庇護十一世的創見，在於他深信教宗良十三世〈新事〉通諭的恆久價值，因此教宗庇護十一世做了一件前所未有的事：寫一份通諭去表揚一位前任教宗的通諭。教宗庇護十一世於一九三二年，為紀念〈新事〉通諭頒佈四十週年，寫了這份〈四十年〉通諭。隨後的多位教宗，也參照教宗庇護十一世的做法，在適當的時候追念〈新事〉通諭，並探討當前的問題。

1891年 良十三世 〈新事〉通諭 *Rerum Novarum*  
1931年 庇護十一世〈四十年〉通諭 *Quadagesimo Anno* 紀念〈新事〉通諭頒行四十週年  
1941年 庇護十二世〈五旬節〉文告 紀念〈新事〉

### 通諭頒行五十週年

1961年 若望二十三世〈慈母與導師〉通諭 *Mater et Magistra* 紀念〈新事〉通諭頒行七十週年  
1971年 保祿六世〈八十週年〉公函 *Octogesima Adveniens* 紀念〈新事〉通諭頒行八十週年  
1981年 若望保祿二世 〈工作〉通諭 *Laborem Exercens* 紀念〈新事〉通諭頒行九十週年  
1991年 若望保祿二世 〈百年〉通諭 *Centesimus Annus* 紀念〈新事〉通諭頒行一百週年

當中一九六一年教宗若望二十三世〈慈母與導師〉通諭，雖然以紀念〈新事〉通諭頒行七十週年為主線，但卻很能彌補〈新事〉通諭的不足。〈新事〉通諭的副題是談勞工問題，著力於工業社會的工人問題，對農業社會的農民生活，著墨不多；若望二十三世的〈慈母與導師〉通諭頗能在這方面作出平衡，以整整一個第二章，去探討現代農業及農民問題。這份通諭亦指出國際間經濟關係平衡的重要，

因當時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亞洲社會出現急劇的現代化及工業化，跨國的經濟剝削亦隨之而生。

到了一九七一年，教宗保祿六世頒佈了〈八十週年〉公函，指出現代世界都市化的問題，最特出的莫過於種種的歧視問題，如種族、國籍、膚色、文化、性別及宗教等歧視。教宗重申，要改善這些歧視的情況，不單要依靠政府立法，還有賴人性的醒覺。而一句經典的說話：「教會首先選擇與貧乏者同行」(Option for the Poor)，就是出自這份通諭。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於一九八一年，發表了〈工作〉通諭，以紀念〈新事〉通諭發行九十週年，兼探討在科技高速發展的當前，勞工所面臨的種種問題。

到了一九九一年，東歐變天，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發佈了〈百年〉通諭，以表揚一百年前教宗良十三世的創見，並回應東歐共產主義陣營瓦解之後的時局。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通諭中重申，縱然社會主義已失敗，但並不表示資本主義全無問題。對於

民主政制，通諭則給予很高的評價。而通諭亦一再重申「首先選擇與貧乏者同行」的原則。

### 〈民族發展〉通諭系列

一九六七年，教宗保祿六世撰寫了〈民族發展〉通諭。這份通諭本來也同樣有〈四十年〉通諭及〈慈母與導師〉通諭的意味，保祿六世在第二節寫道：「我們的先輩、教宗良十三世寫了〈新事〉通諭，庇護十一世頒發了〈四十年〉通諭，庇護十二世向全世界廣播了講詞，若望二十二世頒佈了〈慈母與導師〉、〈和平在世〉通諭，他們忠於自己的職守，以輝煌的文告，煥發福音的真光，照耀了當時的社會問題。」(〈民族發展〉，2)

一九六七年，教宗保祿六世，有鑒於當時世界各地的民族尋求脫離殖民統治的運動如火如荼，成就驕人，但另一方面新國家又未能擺脫貧窮及國內外紛爭，內戰及國際交戰連綿不斷，於是發表了著名的〈民族發展〉通諭，帶出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

「『發展』是和平的新名字」。(《民族發展》，76)，提出扶助弱小民族作可持續發展，才是建樹世界和平的真正方式。一九八七年十二月，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爲紀念《民族發展》通諭頒佈二十年，發表了《社會事務關懷》通諭，除了再次肯定《民族發展》通諭的劃時代及超時代意義外，更審視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全球經濟困境對貧富各國的衝擊。

二零零九年，正值世界又一次面對嚴峻的金融危機，教宗本篤十六世寫了一篇綿長而生動的通諭《在真理中實踐愛德》(以下簡稱「真理中」)，指出解決問題之道，同時向兩位偉大的前任致敬。誠如本篤十六世所說，

可敬的前任教宗保祿六世在一九六七年頒佈了《民族發展》通諭 (Populorum progressio)，以真理的光輝及基督愛心的溫柔光彩發揮了民族發展這個重要課題。他鄭重聲明：宣講基督是人類發展的首要因素，他也吩咐我們要懷著熱誠的愛心及真理的智慧，走上人類發展的

大道。天主賜我們知道是祂首先愛了我們，這真理促使我們也將生命當作奉獻，這樣我們才能希望「發展整個人，發展每個人」，使人類的生活能「從不太符合人性尊嚴，改善到符合人性尊嚴」；當然在這過程中必須克服各種困難。

保祿六世的通諭頒佈至今已四十餘年，本人願向這位前輩表示尊敬讚揚，秉承他對人類全面發展的訓導，按他的指示，把這課題發揮得更合乎今天的處境。天主忠僕若望保祿二世在紀念《民族發展》通諭頒佈二十周年時，發表了《關懷社會事務》通諭 (Sollicitudo rei socialis)，也是為了同樣目的。其實，在這之前，只有《新事》通諭 (Rerum novarum) 曾受到這麼隆重的紀念。在《關懷社會事務》通諭頒佈後二十年的今天，我深信《民族發展》通諭堪稱為「《新事》通諭的現代版」，在人類趨向合一的道路上給予指引。(真理中，∞)

因此，我們可以說《民族發展》通諭自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及教宗本篤十六世的繼往開來之後，又成了《新事》通諭之外的另一個重要的社會訓導系列。教宗本篤十六世特別指出，「歷來只有教宗良十三世一八九一年發表的《新事》通諭，曾受到同樣的高度推崇。」（真理中，8）《民族發展》通諭這個系列的次序如下：

1967年 教宗保祿六世，頒佈《民族發展》通諭（*Populorum Progressio*）

1987年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頒佈《社會事務關懷》

通諭（*Sollicitudo Rei Socialis*）

2009年 教宗本篤十六世頒佈《在真理中實踐愛德》通諭（*Caritas in Veritate*）

## 《在真理中實踐愛德》的要旨

《在真理中實踐愛德》通諭是本篤十六世任內第二道通諭，亦是繼教宗若望保祿二世一九九一年發表《百年》通諭之後的天主教會最新一份社會訓

導通諭。新通諭頒佈於二零零九年六月廿九日，正式於七月七日以意、法、英、德、葡和西班牙文面世。感謝陳日君樞機的努力，中文譯本亦已於九月中面世。

《在真理中實踐愛德》通諭回應了目前的全球經濟危機，指出要消除世界飢餓問題和推動真正的民族發展，便得顧及相關的倫理價值；基督徒務必履行愛德，此舉讓人明白要建設美善社會、要追求真正而整全的發展，基督教信仰的價值是不可或缺的。

新通諭要處理兩項重大問題：每一個人的價值的問題，以及整體人類前景的問題。（真理中，18）為教宗本篤十六世來說，這兩個問題深刻相關相扣。因此，維護生命尊嚴及生命權利，成了維護社會公義的基石。在這理念下，一九六八年教宗保祿六世發表的《人類生命》通諭及一九七五年的《在新世界中傳福音》宗座勸諭，又成了天主教會訓導的重要註釋。（真理中，15）

新通諭洋洋大觀，主線問題的探討十分深入全

面，這包括利潤、自由經濟問題、科技與經濟，以及天主教信仰如何為人類發展作出貢獻等。主線問題以外，很多細節亦寫得非常精彩，例如：墮胎與安樂老如何損及真正的發展；（真理中，28，下同）宗教自由與經濟發展的關係；（29）公民社會在經濟發展中的角色；（38）援助機構佔用援助資源的問題；（47）譴責「色情旅遊業」對民族的傷害；（61）推廣「有尊嚴的工作」的概念；（63）商品的「公平貿易」原則。（66）

## 《在真理中實踐愛德》通諭與「全球化」

教宗本篤十六世《在真理中實踐愛德》通諭當中，著墨最多的單一議題，大概會包括「全球化現象」及「全球化進程」。天主教會與許多非政府組織及壓力團體不同，教會並不視「全球化現象」為一件壞事。

教宗本篤十六世首先引用前任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於二零零一年四月二十七日在宗座社會科學院

所發表的名句。「全球化，在本質上並不屬於善或惡，它端視人們如果處理它。」（真理中，42）

在新通諭中，教宗指出問題所在，「社會愈來愈全球化，這令到我們成為鄰居，卻未有使我們成為手足。理性本質上有能力抓緊人與人之間的公平性，並維持他們在社會上共存的穩定性。但理性並不能建樹友愛。」（真理中，19）

不過，教宗也不忘提出人們的誤解，「有時，全球化會被理解為一個置人於死地的名詞，似乎其所涉及的能量是不知名的反人性力量或獨立於人性意向以外的體制所產生的力量。」（真理中，42）

### 全球化有其價值

然而，實質上卻是，「在有形可見的（全球化）進程中，也反映出人類本質上是愈來愈相互緊扣的；是由無數個人及民族合在一起，承擔個人及集體方面各自的責任，才使這（全球化）過程能締造出裨益及發展。」（真理中，42）



因此，教宗警告說，「盲目反對全球化，會是一項錯誤，亦是帶有偏見的看法，將無法體認出全球化進程的正面價值，因而可能失卻借助全球化而促進人類發展的眾多機緣。」（真理中，42）

教宗同時提出全球化現象的正反兩面，值得我們深思。「全球化進程，當得到正確的理解及引導時，將有機會在全世界的範圍內開展前所未有的大規模財富再分配。但假如全球化進程受到惡劣的引導，將會帶來更多貧乏及不平等，甚至觸發一次全球的危機。因此，必須糾正目前錯誤的手法，這些錯誤十分嚴重，引致民族之間及民族之內出現新的分裂。我們亦應設法確保財富的再分配不會引發赤貧的擴展及增加。假如目前的處境得不到良好的處理，這樣的危險將確實存在。」（真理中，42）

教宗指出，「國際邊界的解體，不光是一個物質性的事實：它在原因及結果上都是一項文化事件。假如我們用命定論的觀點去了解全球化進程，則會喪失正確審量及帶引全球化進程的準則。全球

化進程確是人類實況，是多元文化的產物，必須由人們加以辨別。」（真理中，42）

### 全球化引伸出的問題

全球化的使命之一，就是對貧乏的民族伸出援手。「長久以來，不少人認為貧困民族的發展應停留在某一階段，亦應滿足於已發展民族對他們的善心施予。教宗保祿六世在《民族發展》通諭中強烈反對這種觀點。」（真理中，42）

「今時今日，世界可用於拯救民族脫離赤貧的資源較往日豐富得多。但往往這些資源都操控在已發展的國家手中，他們反過來是從資本與勞力在世界自由流動獲益最多的一群。」（真理中，42）

教宗本篤十六世亦提到全球化之下的國與國之間不合理問題，「在許多國家的預算案政策，往往受到國際金融機構的壓力而被迫削減社會開支，結果讓他們的公民束手無策地面對種種新舊的風險。這份束手無策，亦因為工會組織未能對他們提供有

效保護而日益惡化。」(真理中, 25)

本篤十六世提到，一如若望保祿二世所觀察到的，富國與窮國之間的分野已不如《民族發展》通論發表時（二十世紀六十年代）那麼清晰。世界財富的絕對值不斷增長，但不均等的現象卻有增無已。(真理中, 22)以致「在某些較窮困的區域，卻有一些群體享受著『超前發展』的待遇，他們的浮奢及消費主義行為，與當地周遭持續出現的人性受損所產生的對比，絕對使人無法接受。」(真理中, 22)放眼神州大地，在人均年收入約二千五百美元的低水平的光景下，不少富豪竟然以「一飯萬金」互相攀比，其實背後正埋藏著大量生態受損人文生活受到嚴重剝削的財富傾斜，這正是教宗要譴責的不合理現象。

「全球化要經過一段過渡時期，充滿困難險阻，要克服這一切就一定要掌握那以人為本及道德的精神，這精神從人心的深處，把全球化推向整個社會更團結及更符合人的本性。」(真理中, 42)「可

惜這精神屢次被個人和功利的道德觀和文化取態所推翻、所窒息。」(真理中, 42)

「今日世上也衍生出許多不同的宗教派別，由小團體甚至個人組成，還有一些混合宗教，形成一股離散和缺乏承擔的風氣。全球化可能有的一个負面效果是助長這類混合宗教，滋長某些所謂宗教，把人們彼此隔離而不是使之相遇，更使他們與事實脫節。」(真理中, 25)

本篤十六世引用保祿六世在《八十周年》公函中所論述的，「全球化進程會使意識形態被科技發展所取代，並讓科技成為意識形態力量，人類就會受困於一個先驗的判斷中，使得人們不敢面對存在及真理的領域。」(真理中, 70)

### 全球化與傳播媒體的責任

在種種新事物中，教宗本篤十六世特別提到傳播媒體與全球化的關係。他說：「基於傳播媒體最基本的重要性，在於有能力改變人們對人對事的取

態，因此我們必須仔細反省其影響力，特別是涉及全球化進程中的倫理文化，以及民族在團結共融中的發展。」（真理中，73）

有關普世教會對社會傳播媒體的訓示，有二份教廷文告值得大家首先閱讀，第一是梵二文獻中的《社會傳播工具法令》（中譯本作「大眾傳播工具法令」）；第二是一九七一年宗座社會傳播委員會發表的《溝通與發展》（*Communio et Progressio*）文告；第二篇是教宗本篤十六世本人於二零零八年發表的普世傳播節宗座文告：《自我宣傳抑服務他人——今日媒體何去何從》。

梵二文獻中的《社會傳播工具法令》發佈至今已四十多年，中譯本理應早在中華教會大眾中廣為流傳，在此不必再加介紹了。

《溝通與發展》文告由於一直未有中文版，台灣及大陸的讀者對之所知甚少，但該文告寫得甚有前瞻性。文告第二十一段提出八項問題，要求教會內的傳播工作者及受播者一同正視。這八項問題

到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依然擲地有聲。

1. 我們如何確保面對這排山倒海而來的新聞洪流，能加以正確的評價及理解？
2. 在一個如此重視異見聲音的社會，如何確切分辨對與錯、真與假？
3. 在面對爭取大量受播者的強烈競爭中，如何防止傳播媒介訴諸人類本性中的較低級趣味？
4. 人們如何避免操管傳播的權力集中到少數人士的手中，以至扼殺了真正對話的可能？
5. 人們如何可以避免因借助機器及透過間接的傳播，尤其是音像傳播，而削弱了直接的人際接觸？
6. 當傳播媒體促使人們躲進幻象世界時，如何可以把他們帶回當前的現實世界？
7. 人們如何可以制止傳播媒體鼓吹病態心理及消極心理？
8. 人們如何確保在持續不斷訴諸感性衝擊之下，理性不會受到損害？（《溝通與發展》，21）

至於二零零八年的《普世傳播節文告》，教宗清楚提出，「傳媒以反映現實為名，會把那些歪曲了的個人、家庭及社會生活模式合理化，或把它們強加於人身上。」(2008 宗座文告，2)「今日媒體越來越不只反映真相，而是主宰真相。」(2008 宗座文告，3)「媒體可以及必須對宣揚人性尊嚴的真理作出貢獻，並抗衡那些傾向於否認或摧毀人性尊嚴的人士。我們甚至可以說，尋找及展示有關人性尊嚴的真理，構成社會傳播的最崇高使命。」(2008 宗座文告，5)「教宗秉承前人的智慧而加以發揚的，在於清楚界分「真相」與「真理」的區別，要求傳播媒體傳達的核心是真理及人性尊嚴。明白到這一點，我們就更能掌握以下的段落。」

「既然全球化進程及民族發展必須考慮倫理氛圍，傳播媒體的意義及目的，亦應從人類學視野中去探索。這表示我們不但要幸賴於科技發展，提高了資訊交流的可能性，而達致文明的效果，更在一切之上有賴合乎人性的，其反映真正的普世價

值。」(真理中，73)「單就社會傳播工具提高了人際連繫及思想傳遞的可能性，並不就能促進自由，及為所有人帶來國際化的發展與民主。要達成這些目的，必須專注於提昇個人及民族的尊嚴，他們必須明顯地受愛心所啓動，而置身服務於真理、善意、以及本性和超性的友愛中。」(真理中，73)

「事實上，人類自由與這些崇高的價值息息相關。傳播媒體在用來提昇普世對正義的探求時，能為此作出重大的貢獻，去促進人類大家庭共融的增長，及社會的愛心。」(真理中，73)「揭示真相，只關乎科技；揭示真理，則關乎倫理。總結一句，教宗明白指出，社會傳播工具在人類發展中的成敗，不是一個科技問題，而是一個倫理問題。」

## 對全球化的總結

本篤十六世提到，「真正全球化進程的以及其基本的倫理要求，是來自人類大家庭的團結及人類向善的發展。因此，有賴可持續的委身，以推進個

人爲基礎及以社區及主導的全球性文化融合的進程，這進程也向超性價值開放。」（真理中，42）

「〈民族發展〉通諭頒佈四十多年後，『發展』

這個基本主題依然是個未解決的問題。尤其在目前的經濟金融危機中，它更顯得嚴峻且迫切。雖然地球上某些從前爲貧窮所困的地區，在經濟上及在參與世界生產方面，有了顯著的改進，其他地區卻依然生活在赤貧的情況之下，與保祿六世時的情形相若，甚至有些情形更可說是一個退步。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引起這狀況的原因，早已在〈民族發展〉通諭中道出，譬如：經濟高度發展的國家實施高關稅，阻止來自貧窮國家的產品進入富有國家的市場。另些原因在通諭中只被暗示，後來才較明顯地呈顯出來了。這正是對當時進行得如火如荼的去殖民過程作評價的情況。保祿六世那時期望它是一個自主的進程，在自由及在和平中完成。過了四十年，我們得承認這條路是如何重重困難，一方面由於一些新型態的殖民主義的興起，以及舊的和新的

強權國家的操控，另一方面也由於獨立起來的國家內部嚴重的不負責任。」（真理中，33）

「最主要的新因素是：一個全球性的彼此依存經已來臨，這已被通稱爲全球化。對這事保祿六世已預知一隅，然而它發展的規模及衝擊的程度，卻是出人意表的。這過程源自經濟高度發展的國家，卻自然地牽動了各地的經濟。它尤其推動了不少地區脫離貧窮，這本來是一個大好的機遇。不過，沒有了在真理中的愛作引導，這全球性的推進有可能造成前所未有的損害，並在人類家庭中造成新的分裂。因此真理及愛把一個空前及富挑戰性的責任置放在我們面前，這固然是個非常大及複雜的責任。也就是說我們要擴闊我們的理性，使它認識及引導這些新的發展，促使它向『愛的文明』邁進，這文明的種子天主早已散播在每個民族、每個文化中。」（真理中，33）

作爲一個二十一世紀的世界領袖，在全球充滿相對主義之下，教宗很勇敢地提出，全球化的成功，

與信仰幅度實在息息相關。「全球化是一個多面體及極其複雜的現象，人類必須在這眾多不同的幅度，包括神學的幅度中，掌握全球進程的多元不同性及其一致性。」（真理中，42）人類未能正視將發展與信仰脫離所產生的惡果，正是目前全球化產生出種種問題的根源所在。

## 結論

教會的社會訓導是天主賜給教會全體信眾及世人的瑰寶，只可惜在過往未受到應得的重視，教會內外對社會訓導未有給予足夠的關注，又或對之非常重視，但卻束之高閣，以至有人稱這為「教會保存得最好的秘密」。（Our Best Kept Secret）<sup>1</sup>

在華人教會方面，大多數教會社會訓導均已譯成中文，而歷來介紹社會訓導的書籍，亦並不缺乏，

<sup>1</sup> DeBerti, Hug, Henriot and Schultheis, 2004, *Our*

*Best Kept Secret*, Orbis Books, NY.

當中計有江長流編譯有《教會對社會問題的立場》（一九八九年由真福出版社出版）房志榮神父等學者著有《信仰與正義》（一九九零年四月由光啓出版社出版）；謝華生神父著有《天主教社會訓導》（一九九一年十月由安道社會學社出版）等等，白正龍蒙席及黃俊傑神父亦有這方面的著作。

香港教區正義和平委員會亦於一九九七年六月出版了《天主教社會訓導文獻簡易本》的教材套，並於二零零一年增編為《正義道中尋》一書。

教廷方面，宗座正義和平委員會於二零零四年出版了「教會社會導訓文獻的導讀」，英文題為《Compendium of the Social Doctrine of the Church》在陳日君樞機的積極鼓勵及全力支持之下，香港教區編譯了該本導讀，並於年前以非賣品形式出版了《教會社會訓導彙編試譯本》，正式版本亦將於不久將來面世。希望教友讀者能從中得到更多的啟發。

事實上，教友生活在社會之中，理所當然應有更多機會體驗社會發展所帶的種種困難，亦應更深刻看

到種種機遇，而且亦是站在參與社會事務的最前列，因此歷來多任教宗都特別呼籲平信徒應更積極地展示對社會事務的關懷，若望保祿二世這樣說：

在第一次大戰後，階級鬥爭風起雲湧的動蕩時期，教會即曾站出來干預，保護人免遭經濟剝削及免受極權政制的暴虐。二次大戰後，她又以人性尊嚴作為自己訊息的重心，堅持物質財富乃為眾人之用，至於社會秩序則不應有重重壓逼而應基於團結合作的精神。教會亦曾反覆言及人與社會，除了需要物質財富外，還有精神與宗教方面的價值。……「新事物」通諭印行面世百年後，教會發現自己依然面對著「新事物」、新挑戰。故此，百週年紀念應首先獲得善心人士的投身參與及迎接挑戰，這點尤以信眾為甚。（《百年》，61）

筆者多年前前首次出任天主教香港教區正義和平委員會委員時，即感到作為教友，我們對推廣天

主教社會訓導，更懷有特別的責任，就如教宗保祿六世所說，「我們最先呼籲我們的神子，在著手開發的國家裡，教友更應以改善物質秩序為己任，如果聖統人員的責任是教導、和正確地解釋實施改善應依循的倫理原則，那末，他們不要被動地等待命令和指示，該自動發起，以基督精神，去感化人心、風俗、以及共同的生活規律和機構，變更及徹底而適當的革新是必需的，但該致力於灌輸給他們福音的精神，對於更進步國家的教友，我們要求他們，以他們的專長和積極的工作，去參加公立或私立，國家或宗教的組織，從事克服開發國家的困難，他們應該決心，在從事切切實實地建立正義公平的國際道德者之中，站在前列不可怯退。」（《民族發展》通諭，81）在二零一一年「教友年」來臨之際，謹此與教會內全體弟兄姊妹共勉。

□